

百年党史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根本原则的确立与实现

聂文婷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新的革命军队的过程中,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在军事实践中,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过程,就是实现这一根本原则的过程。革命战争年代,党始终保持对人民军队领导的绝对独立与绝对权威,丰富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内涵,在领导革命斗争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中持续实现了这一根本原则。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制定了新的最高军事领导制度,保证了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高度一致,有效推动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进一步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采取诸多措施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随着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全面贯彻和深入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得以根本实现。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人民军队; 绝对领导; 根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22]12-0015-12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2.12.011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①人民军队由中国共产党缔造,一经诞生便与党紧紧联系在一起。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在创建新的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得以确立。一路走来,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实质上讲,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过程,就是实现这一根本原则的过程。

一、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如何掌握武装力量的问题。但在大革命后期,由于“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②。总结教训,党深刻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领导权的重要性,开始创建一支新的革命军队。在此期间,党有效解决了军队中党和个人“谁领导军队”、政治和军事“谁领导谁”等争议,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一) 大革命时期,党开始探索掌握武装力量领导权的问题

能否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是党领导下的军事行动可否取胜的关键。然而,在刚刚成立的三四年间,我们党“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直至1924年参加黄埔军校,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收稿日期:2022-07-08

作者简介:聂文婷(1985—),女,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史与国防史。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1258页。

“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①。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决议案提出:为更好地组织武装力量,中央之下应有“军事运动委员会”^②。12月,中央发出第68号通告,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军事部”。^③随即中央军事部成立,负责指导全党的军事工作。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各地军事工作负责同志,应与当地党的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向书记报告工作情形,并和书记商量自己工作。”^④从中可以看出,明确党对军事工作、军事工作负责人向党组织负责人的责任归属,是我们党在军事实践中探索如何掌握武装力量的开端。

1926年7月,北伐军出征在即,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的讲话中,提出军队政治工作要有“党化”之首要目的。周恩来认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以党的政策为遵循,同时“革命军是建设的”,斗争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消灭敌人、扩张自己,“我们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⑤这里提出的军队要“党化”,与我们党后来所讲的“党军”内涵一致,即毛泽东明指的,“这是指的党的领导”^⑥。由此进一步说明,在掌握武装力量领导权的问题上,从北伐战争开始我们党就已经试图在军事行动中发挥实质性的领导作用了,这为国共合作背景下党参与军事实践赢得了主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军事实践以共产党员承担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为主,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党实际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在军队中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由此军队一新其面目,“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⑦

在这段时期的军事实践中,党还进一步认识到,积极掌握武装力量亦可巩固且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比如,在北伐战争中,党已在事实上直接掌握和领导了叶挺独立团。这是我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支军队,“军队中有党的组织”,由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并起到了冲锋在前的模范作用,还有党领导的“政治训练”,又在革命沿途得到了“湖南、江西两省广大的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⑧因此,叶挺独立团后来之所以被冠以“铁军”威名,不仅是因为创造了赫赫战绩,更重要的是,它始终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行动和战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造就了叶挺独立团铁一般的力量”^⑨，“以后的工农红军之所以有力量,原因也在这里”^⑩。

(二) 创建新的革命军队,以政治可靠为基本原则,在部队各级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初步实现了党对军队绝对坚决、绝对直接的领导

从有意识地要直接掌握武装力量,到必须确立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权,这一有关军事领导权认识上的变化,源于对此前武装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全面总结。1927年4月、7月,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百姓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在血雨腥风中,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自此,党“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⑪。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军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①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3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6页。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

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⑧《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

⑨杨明伟《从历史关节点看毛泽东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

⑩《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于此发端。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这里,毛泽东的深意在于,只有通过绝对坚决的军事行动,才能取得军事行动的绝对胜利并由此夺取政权,而要保证军事行动的绝对坚决,首先党要对军队保持“非常”之领导。据此,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特发通告郑重指出“在这总的武装暴动工农革命政策之下,党的作用高于一切。”^②显然,从强调党要“非常注意”军事,到指明党在军事行动中“高于一切”的作用,党要绝对性地领导军队之意味已经极其鲜明了。这主要体现为在创建新的革命军队的实践中,党着力强调政治可靠的建军原则,在此基础上,又在部队各级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

一方面,要创造一支政治可靠的革命军队。政治立场的绝对坚决,是军事行动绝对坚决的必要前提。但实践表明,革命中的雇佣军人在政治上并不坚定,很容易反过来被军阀利用。鉴于此,1927年8月21日,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指出“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创造一支政治可靠的“新的革命军队”,“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③这些要求从根本上决定了这支新的革命军队的政治属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此后所有军事实践的大前提、总前提,保证了军队能够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绝对坚决地在党的旗帜下行动和战斗。

另一方面,逐步健全党的组织单位。在南昌起义中,作为党的指导机关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此时的前敌委员会跟军、师之间的关系还不是绝对领导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协商关系,这种组织措施必然难以完全控制和掌握部队。于是,第一阶段起义一结束,前敌委员会就整编起义军,团建立党支部,营建立党小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急于转战,未做好整顿工作便仓促出发。途中,或因战损,或因叛逃,部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减员。这无疑再次暴露了军队中党的现行组织尚未完全抓住士兵的问题。此时,由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部队在去往农村山区的路上也出现了一路溃散的情况。为扭转危局,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领导起义军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具体措施包括: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营、团建立党委,把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小组,等等。这其中,最具开创意义的是连队党支部的建立,标志着部队有了坚强的战斗堡垒。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④所以,从南昌起义时的支部建在团上,到三湾改编时的支部建在连上,不是单纯的组织架构的下沉,而是对党的领导的强化。它促使军队中各个层级包括基层单位都能直接而不是间接地领会党的意图、任务和要求,然后再依托各级党组织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意图、任务和要求被广泛地而不是个别地落实到每一个战斗员身上,这就自上而下、由面及点地确保了党对军队绝对直接的领导。

(三) 解决红军中党和个人“谁领导军队”、政治和军事“谁领导谁”的争论,军队中党的领导权被绝对建立起来

一边创建革命军队,一边开展革命斗争。党逐渐认识到,党之于军队“高于一切”的领导,不仅要体现在政治上、组织中,更重要的是要以根本原则的方式把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牢牢地固定下来,从而切实保证这一领导权能够在军事实践中得以实现并发挥作用。但这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尤其在红军创建伊始,军队中还存在党和个人“谁领导军队”、政治和军事“谁领导谁”的思想较量。思想决定行动,不统一思想,就无法统一行动,就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必须解决军队中这些“谁支配谁”的争议,从而进一步明确军队中党的领导权问题。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1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讲到红四军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用“绝对”二字来强调党对军队的支配关系。这时,一支新式的红军队伍逐渐壮大,其中发展比较突出的是红四军。然而,红四军自成立以来就存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尤以“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争论最为激烈。^①须知,红军在旧军队的基础上改造而建,旧式军队中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以及以往斗争中个人庞大的领导权,必然会在现时的革命军队中留有遗存,从而产生致使“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②的消极作用力。

越是队伍壮大、越是斗争复杂,就越要彻底解决军队中党和个人“谁领导军队”的争论,否则,两者“总是抗分,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③,这对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都极为不利。究竟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点名肯定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做法,“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④。毛泽东所说的指导员支配军官并不代表单纯的个人行为,军官支配子弹也不仅指简单的军事行动,从深层次理解,则是蕴含着党组织对军队、对军事行动的绝对支配关系。就这样,以“树典范”的方式回应军队中“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争论,毛泽东已然作出了旗帜鲜明的表态:必须由党来领导军队,而且要绝对地领导军队。

此外,红四军中还存在政治和军事“谁领导谁”的观点分歧。这源于一种非常盛行的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本末倒置地“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有的地方还“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从而引发“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⑤针对以上思想动态,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指出,必须坚决批驳并彻底纠正单纯的军事观点,诸多策略之关键就是要强化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一方面,确定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提出了要使党成为“领导的中枢”^⑥的重要论断。“中枢”即指事物中起主导作用的部分,因此,以“中枢”形象地突出党对军队的绝对引领作用,是对“军事领导政治”观点、“以军队控制政权”倾向的彻底否定。另一方面,明确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职责。古田会议决议案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⑦根据这一要求,此后党要对军队中的“一切工作”负责,这就从职责范畴方面进一步阐明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问题。特别需要指明的是,对于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的这些有关党对军队领导权的绝对性原则和要求,“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⑧,红军由此成为真正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⑨,这也标志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的确立。

二、保证党对军队领导的绝对独立与权威

在指导思想上以根本原则的方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后,接下来就要看如何在军事实践中真正实现这一原则。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确立过程,就是实现这一原则的过程。但这同样并非一件容易之事。身处错综复杂的战争环境,要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党、对军队都是极大考验。只有党和军队共同致力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一方面,党要对革命力量保持绝对独立的领导,另一方面,军队要以党的领导为绝对权威,才能在保证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5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页。

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9页。

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9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页。

(一)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党既秉求统一、又坚持独立,既争取团结、又敢于斗争,保持了对所创造革命力量的绝对独立领导

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同意改编红军的组织序列于国民革命军。但为统一战线而改编军队,不是毫无原则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也不是没有底线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必须看到,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打上了通过改编垄断军事领导权的如意算盘,而在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投降主义的倾向。有人发出疑问“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甚至还有个人在红军改编后“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党“作了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①

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告全党同志书》中作出声明:实现统一战线,“决不是等于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也不是等于对于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创造的有组织的与有高度觉悟的革命力量放弃领导”因此,必须在改编中“保持本党组织的独立性”,我们党“对国民党让步与妥协的最后限度”是“对于本党所创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领导”。^②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认识更具辩证性和战略性。他认为,“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实际是在争取各党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从全局来看,在当时的斗争条件下,各党派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御外敌。而要实现团结,正如毛泽东所说,就必须既“坚持统一战线”,这显然是为了团结,又要“坚持党的独立性”,这实质也是为了团结。^③总之,团结既是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依据毛泽东这一深刻认识,党在改编过程中基本实现了对自己所创造军队的独立领导。

然而,1937年7月,还是发生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近千人在接受改编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的事。^④这就警醒我们,在新的环境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独立领导,还尚未引起高度的重视,所以才因丧失警惕而被钻了空子,致使党的军事工作受到损失。于是,中共中央“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⑤并向南方各游击区域发出紧急指示:关于武装问题,必须“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具体来看,在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之前,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要“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当改变番号与编制之后,则更须保证党的绝对独立领导,对国民党的工作,既要奉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主张”,也要“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当受到进攻时,“我们仍应坚持自卫的游击战争”。^⑥

在初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后,为“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的命令。”^⑦在这方面,针对八路军、新四军一度出现的政治工作滑坡松懈问题,党尤其重视恢复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当时,一个影响比较大的问题是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这就显著削弱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军队的作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吃得开的是副官,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⑧。对于诸如此类“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做法,中共中央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郑重指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393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52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4页。

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5页。

⑧《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要“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①中央还通过《关于建军问题的决定》强调“党要建立一支铁的党军……这支军队要有巩固健全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和党的支部之制度和工作的,以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掌握党军在政治上须是绝对忠实于共产党。”^②此后,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的明显好转,广大官兵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也有了更为充分的认识。1942年2月10日,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在《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政治工作》中,分析阐释了当时部队政治工作建设的中心方向,就是要“巩固党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党的单一绝对的领导”。^③这一认识遂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自觉,进一步推动了党对军队绝对独立领导的实现。

(二) 坚决抵制一切削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人和事,树立起党对军队的绝对权威领导

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党不仅强调对军队领导对外的绝对独立性,亦非常重视对军队领导向内的绝对权威性。之所以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权威领导,个中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针对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拥兵自重,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行为。“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④,因此,张国焘向党中央争夺兵权,就是在挑战党之于军队绝对唯一的“创始人”权威。二是汲取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教训。这一事变提醒我党: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也有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的可能。因此,必须树立并提升党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领导,“使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⑤。鉴于以上问题,我们党主要从三个方面加强了对军队的绝对权威领导。

第一,提出“党指挥枪”的原则。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就非常注意保持在军队中的权威性领导,周恩来曾明确提出“政治上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红军中只有党的一个领导,不能容许有第二个领导。”^⑥面对此后发生的张国焘事件,中共中央更深切体会到建立党对军队绝对权威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在1935年8月召开的沙窝会议上,党中央强调指出:要“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⑦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分析说“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之所以“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没有军队。因此,党要“闹出名堂”,必须掌握军队,而这项使命对于共产党员来讲,最首要的就是“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但绝对“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⑧“党指挥枪”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又一形象化表述,丰富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内涵,提升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权威性。

第二,强调军队要以党的领导为绝对权威。事实上,经过一段时间革命斗争实践的检验与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已经在军队中基本巩固起来了。对此,朱德曾在1940年8月20日发表的《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一文中,充满自信地指出“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同时,我们部队中的党员和非党的战士,又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了这个领导的绝对正确,因此,他们就无条件地接受这个领导。这就是现在我们党对于军队领导的最基本的保证,也就是党在军队中有着最高的威信的原因。”^⑨但此后还是发生了皖南事变的悲剧。这即说明,的确有一些而且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

②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③《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页。

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1页。

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547页。

⑨《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

是“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不尊重、不服从党中央的权威领导，照此下去，“结果总是要失败的”。所以一得知事变发生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严肃客观地指出了项英、袁国平所犯的错误，并警示全党“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还就此事“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①根据这一指示，新军部提出整改原则。经此一改，新四军能够在军事行动中绝对服从于党的领导，能够完整坚决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命令，这无疑证明了党在军队中的权威领导已经建立起来。

第三，通过建章立制，巩固党的权威领导。在实现党对军队绝对权威领导的过程中，党还极力克服了由单纯首长制而产生的缺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全军恢复了一度取消的党委制。194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②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初稿）》，明确规定“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以党委员会作为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这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形式。^③此后，随着解放战争态势由分散游击转为集中对抗，迫切需要对军队的纪律和行为作出严格的、统一的规范，以克服军队中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无政府状态、山头主义和游击主义。于是，中共中央又多次作出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对“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案”^④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要求全军“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⑤。

这些制度规定，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正如毛泽东在此之前就已总结指出的“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⑥，也为赢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方面曾对失利战局作一反思后得出结论：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能节节胜利，就是因为“从来都是强调以党领军”^⑦。此言一语中的。这就是我们的宣言与信心：“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⑧就这样，随着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党也进一步实现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确保全国武装力量由党中央统一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担负起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我们党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党、军队关系的基本理论，军队亦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接下来执政领军的过程中，党还必须准确定位党、国家和军队的关系。通过确立并完善最高军事领导制度，我们党在继续坚持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在国家中建立了统一的军队，这实际上又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党还强调指出，无论何时何地人民军队都要始终进行彻底的、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实践。正是在这一人民军队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路径之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得以持续实现。

（一）确立并完善最高军事领导制度，将党领导军队的特殊政治要求与国家机构职能发挥、军队组织指挥融为一体，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对国家与军队的关系作出了未雨绸缪的思考。他认为“‘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中国只应该建立新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③《我军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工作条例汇编》，解放军总政治组织部1977年编印，第155页。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0页。

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⑦李云汉主编《蒋中正先生在台军事言论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9页。

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①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军队必然要有国家及其政府的实体性归属,但这种归属对政权形态是有要求的,即这个国家必须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个政府必须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明确指出,即便归属国家和政府,人民军队归根结底还是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毛泽东的这一认识,为新中国成立后确立最高军事领导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了新中国的军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家政权系统,是制定军事战略方针、领导军队建设的最高指挥机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负责的共产党员,直接受中央政治局领导,不另设党组。”^③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政权系统进行了调整,明确了国家最高军事领导制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有“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的职权。^④同期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在国家体制中设立了国防部。^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行撤销。

新的最高军事领导制度,明晰了国家和军队的关系,突出强调了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军队在领导指挥、规章制度、体制编制和纪律约束等方面的“统一”内涵,这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具体要求完全一致。因此,由国家政权系统统率人民武装力量,实质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的领导意志。换言之,军队从属国家的定位,并没有削弱、反而是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1950年5月召开的全军参谋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军队内党的领导是最强的”^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只容许共产党来领导军队”^⑦。强调党对军队“最强”之领导,是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之绝对坚决、绝对独立、绝对权威的高度概括,实际上也赋予了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强大的实践伟力。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的军事实践,无论是继续向全国大进军、剿灭土匪、解放沿海岛屿,还是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都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在此后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设立相应的军事领导机关。1954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领导全部军事工作”^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是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最高机关,凡属全军性质的重大问题,均由中央军委集体研究。此后,中央军委一直以唯一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行使领导职能。

直到1982年,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⑨在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中央军委”)的同时,党的中央军委仍然作为党中央的军事领导机关直接领导军队。但为避免机构重叠,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党的中央军委和国家中央军委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都简称“中央军委”,对军队的领导职能及组成人员完全相同。中央军委在党和国家层面的一体化设置,是党在完善最高军事领导制度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3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2页。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1、533页。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1页。

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⑦《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⑧《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1927—1996)》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1页。

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

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党创造性地将国体、政体和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最高军事领导的制度优势,实现了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和军队的行动的高度统一,这样更有利于党运用国家力量领导军队,是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进一步强化。还要看到,在这一时期的最高军事领导制度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既为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又是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就在最高领导权方面使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加集中、更加直接、更加权威,从而有力保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实现。

(二)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

我军既是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是人民的军队。人民性是人民军队与生俱来的鲜明特质。彻底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人民军队自创建时就明确了立场和态度。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确立了“紧紧地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①。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以保障人民自由、保护人民利益为行动要义。一直以来,人民军队就如同中国共产党的化身,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服务群众,这一始终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努力奋斗的过程,就是人民军队忠诚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过程,也是持续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过程。

在此路径下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外,还开展了有理有力的政治工作。1944年4月11日,毛泽东在审阅由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段文字,其中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②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党的领导对于实现军队与人民相结合、军队为人民之军队所具有的极端核心作用,而要实现这种作用力,中间的必需环节就是要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这是对革命年代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是经过长期斗争实践检验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开展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新中国成立后,党高度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从政治、思想、组织、制度、作风等多方面打出政治工作“组合拳”。有效的政治工作与军事行动相辅相成、相融共促,保证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勇敢斗争、不懈奋斗。

第一,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专门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使全体军人牢固树立党绝对领导军队、军队要始终不渝为党的任务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思想。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面对全新的国内外环境和艰巨的改革重任,党中央、中央军委多次强调,要紧紧抓住提高官兵政治素质这个根本,加强新时期人民军队的政治理论教育,以官兵合格的政治力持续赋能人民军队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二,与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相适应,按照党的要求建设好军队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1950年4月,成立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随后,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以及兵团(省军区)、师(军分区)、团(人民武装部),均建立健全了政治部(处),构建了全军统一的政治工作领导机构。此外,还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全军普遍建立起连队党支部,形成了坚强的集体领导。

第三,重视制度建设使军队政治工作有章可循。195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全军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则(草案)》,对加强军队中党的领导、统一全军思想和行动起了重要作用。^③改革开放后,依据新时期军队建设之需,又多次重新修订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不断规范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主要内容、重要原则、方式方法和职责要求,及时回答和解决了政治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做好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第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着力培养勇于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合格军人。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和军队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始终强调,革命军队要坚定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信念,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用坚强的党性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从总体上看,这段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还因使命任务的广泛性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比如,在全国土改运动期间,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官兵深刻认识到土地改革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便更加坚决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党的政策,站稳立场,保卫、支持和帮助地方进行土地改革。不难总结,尽管军事斗争任务不尽一致,军事实践要求也有所不同,但人民军队贯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奋斗主题从未改变,这就从实践方面切实鲜明地体现了“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同时也确保了人民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①从而进一步实现了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高度一致。

四、从根本上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中,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始终扭住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持续开展铸牢军魂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官兵,提高广大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觉,在强军改革和军队党的建设中,坚持并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特别重要的是,全面贯彻和深入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从根本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 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铸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态势,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州战区考察工作时,郑重提出了强军梦。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②此后,习近平又将强军梦具体化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③。2017年,在全面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④依据强军目标,人民军队强或不强,听党指挥是第一标准。因此,为推进和实现强军梦、强军目标,习近平提出了“三个牢记”的要求,第一条便是“要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⑤。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围绕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出了“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⑥的战略要求,这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引领了正确的政治航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根据以上战略部署和要求,党中央、中央军委始终将铸牢强军之魂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2013年初,全军同时开展“坚定信念、铸牢军魂”“学习贯彻党章、弘扬优良作风”两项重大教育活动,后又开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0页。

④《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⑥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5页。

展了“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通过不间断向铸牢军魂用力,实现了人民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不动摇、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而这两个“不动摇”,又在同时期进行的强军改革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场改革,之所以能够创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改革事业力度、深度、广度之最,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改革能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顺利推进和不断深化。一方面,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还是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抑或是军事政策制度改革,都以不同方式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另一方面,全军和武警部队都能以党的领导为坚定的政治方向,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号令意识,自觉站在全局高度认识改革,正确对待利益调整,以始终听从党中央领导和中央军委指挥的实际行动坚决拥护改革、积极投身改革。

(二) 加强党的理论学习,以理论武装、理论清醒确保政治坚定

政治上坚定,关键要理论上坚定。在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得以实现的过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军队,进一步打牢全体官兵的思想政治根基。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2012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就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指出,人民军队要注重加强理论学习,以扎实的理论学习夯实思想政治根基。此后,在全军按照走在前列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同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又提出,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①,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理论武装、理论清醒确保政治坚定。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党中央、中央军委第一时间组织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此后,又在组织全军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期间,开展了党史国史军史学习教育。党的二十大召开后,中央军委立刻对全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出部署,提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全军的首要政治任务”^②。

除全面学习外,全军还更为突出地学习了习近平强军思想。经中央军委批准,先后在全军部队印发了《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二)》《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三)》,印发了《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指示读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学习读本》等教育教材。在夯实理论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召开后,中央军委又提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开展‘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教育实践活动”^③。通过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在领导新时代强军事业中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的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全军官兵在不断提高理论素养的同时,还获得了能够始终做到对党忠诚最可宝贵的政治滋养和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

(三) 加强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锻造听党指挥先锋利剑

2013年11月7日,习近平在接见全军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代表时强调指出“军队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也是对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④根据这一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党的建设始终以锻造一支听党指挥的先锋利剑为核心任务。其间,中央军委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于2013年11月召开全军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各级党组织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措施办法;于2014年10月在福建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⑤;于2018年8月召开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就全面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作出战略部署。

聚焦具体工作,军队党的建设主要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

①《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 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求是》2021年第15期。

②《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人民日报》2022年11月7日。

③《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人民日报》2022年11月7日。

④《不断提高军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思想和组织保证》,《人民日报》2013年11月7日。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01页。

观,大力倡导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展“学习践行强军目标,做新一代革命军人”主题教育,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通过在党的旗帜下固本培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被转化为人民军队的自觉行动,人民军队真正成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威武之师。其次,重塑军队政治生态,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新时代,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军队党的建设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狠抓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紧盯“四风”新动向新表现精准施治,深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过坚持不懈整肃军队政治纲纪,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一度弱化的问题得到有力解决,军队政治生态一度恶化的局面得到有力扭转。再次,深化军队党的建设制度改革。2018年9月,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①2020年9月,在全军颁布施行《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对军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军队党的建设责任制和监督保障机制等作了全面规定。^②这些制度的实施,全面提高了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的质量,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四)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得以根本实现

围绕最高军事领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要全面贯彻和深入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是党和国家军事领导制度长期发展的重大成果,凝结着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实现形式”^③。

自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就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重大决策部署。首先,重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保证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有效实施。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统御于军委主席,解决了中央军委如何高效指挥军队、如何科学谋划和加强部队建设管理的问题。其次,打造精锐作战力量,构建有利于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和高效决策指挥的力量体系。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裁减军队员额30万,横向优化军队兵力规模构成,纵向调整各军兵种内部力量结构和后备力量结构。同时,将部队编成结构由“军—师—团—营”四级制改成“军—旅—营”三级制。随着指挥层级的减少,指挥关系更加简洁,指挥效能大大提高,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军委主席一声令下,一支精干的、具备多种能力和广泛作战适应性的现代化军队能够高速有效地冲向前、顶得住、打得赢。再次,建规立制,推动军委主席负责制机制化运行。2012年11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在修订《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规则》时,郑重写上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④2014年4月10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的意见》,要求建立和完善请示报告、督促检查、信息服务三项工作机制,推动军委主席负责制各项要求机制化运行。^⑤此后,为加大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力度,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写入党章,随后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⑥2018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读本》出版并印发全军。^⑦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体制机制”。^⑧11月,(下转第66页)

①《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18年9月7日。

②《〈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颁布》,《人民日报》2020年9月10日。

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91页。

④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问答》,解放军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6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强军十年大事记》,《解放军报》2022年10月10日。

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1月6日。

⑦《〈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读本〉印发全军》,《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

⑧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5页。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让我们一起行动,在人工智能完全起飞之前对人类社会进行改善。”^①因为只有合理利用先进的生物技术和智能技术,让人类的身体和思维不断增强,人类才有资格和“资本”掌握人机关系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才有能力探索人与智能机器人共存、相处的恰当方式。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我们必须在社会智能化进程中,破除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宰意识,克服狂妄自大的傲慢与自以为是的偏见,“搞清楚强化的人类和人性化的机器两者的地位、局限”^②,促进智能机器人与人自身的相互提升,尝试建立相互尊重、互相协作、和谐共处的人机关系。由于智能机器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如果人类继续固守人是万物之灵和世界的主宰的传统观念,完全无视智能机器人的智能、权利和尊严,那么人机之间的矛盾就可能越积越多,冲突就可能难以避免。至于矛盾和冲突将在什么层面、以何种形式出现,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将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加以解决,一切都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综上所述,人类已经迈过全新的智能时代的门槛,智能机器人将会在许多方面超越人类并得到广泛使用,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机共存、人机竞争、人机交互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但人类没有必要因此而悲观绝望,“我们就是未来生命的守护者,因为人工智能时代正在由我们塑造”^③。只要我们善于运用先进的生物技术、智能技术“武装”自己,使自己成为与时俱进的“人工智能时代新人”,并且善于与强大的智能机器人协作,我们仍然有机会主导新型的人机关系,建设一种人机协作、人机和谐、人机一体化的新型文明形态。

(责任编辑:周文升)

(上接第26页)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全军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落实的若干意见》,要求全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强化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政治自觉,把习近平主席和军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④随着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全面贯彻和深入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得以根本实现。

以南昌起义为发端,经历三湾改编奠基,通过古田会议定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得以确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过程,就是这一根本原则得以实现的过程。革命战争年代,党始终保持对人民军队领导的绝对独立和绝对权威,在领导革命斗争不断走向胜利中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党制定完善了最高军事领导制度,保持了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的高度一致,有效促成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持续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切实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贯彻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在此期间,随着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全面贯彻和深入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得以根本实现。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之本、立军之本、强军之本。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才能持续不断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责任编辑:刘要停)

①[美]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汪婕舒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444页。

②[美]约翰·乔丹《机器人与人》,刘宇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6页。

③[美]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汪婕舒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445页。

④《〈关于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落实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22年11月3日。